

中国文学编年史

元
代
卷

主编◇陈文新

本卷主编◇余来明

湖南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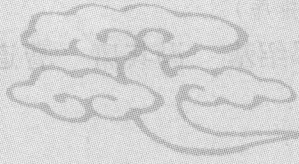
主编◇陈文新

本卷主编◇余来明

中国文学编年史

元
代
卷

盧中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文学编年史. 元代卷 / 陈文新主编; 余来明分册主编.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6.9

ISBN 7-5438-4555-5

I. 中... II. ①陈...②余... III. ①文学史—编年史—中国—元代 IV. I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21911 号

182

中国文学编年史·元代卷

责任编辑: 李建国 胡如虹 曹有鹏
 聂双武 张志红 杨 纯 邓胜文

主 编: 陈文新

书名题字: 卢中南

装帧设计: 陈 新

出 版: 湖南人民出版社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

市场营销: 0731-2226732

网 址: <http://www.hnppp.com>

邮 编: 410005

制 作: 湖南潇湘出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电 话: 0731-2229693 2229692

印 刷: 中华商务联合印刷 (广东) 有限公司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4 1/16

印 张: 33

字 数: 730,000

书 号: ISBN 7-5438-4555-5/I · 458

定 价: 246.00 元

《中国文学编年史》编纂委员会

顾 问 (按姓氏笔画排序)

卞孝萱 邓绍基 冯其庸 曹道衡 傅璇琮
霍松林

主 编 陈文新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石观海 李建国 汪春泓 陈文新 张思齐
张玉璞 於可训 赵伯陶 赵逵夫 胡如虹
诸葛忆兵 曹有鹏 熊治祁 熊礼汇 霍有明

本卷撰稿人

余来明

结。但是，由于风会之说仅能言其大概，“个别”和“例外”（即使是非常重要的“个别”和“例外”）往往被忽略，不免留下遗憾。一些跨时代的作家，如李煜、刘基、张岱等人，在文学史中的时代归属与其代表作的实际创作年代也常有不吻合的情形。例如，李煜被视为南唐作家，而他最好的词写在宋初；刘基被视为明代作家，而他最好的诗、文写在元末；张岱被视为明代作家，而其代表作多写于清初。比上述情形更具普遍性的，还有下述事实：我们讲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往往以毛宗岗修订本为例；我们讲施耐庵的《水浒传》，往往以百回繁本为例；我们讲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往往以崇祯本为例。这就出现了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我们讲的并不是作家的原著；第二，我们忽略了读者的接受情形。这类涉及风会与例外、作家时代归属与作品实际创作、传播与接受两方面的问题，以纪传体来解决，由于受到体例的限制，往往力不从心，采用编年体，解决起来就方便多了：不难依次排列，以展开具体而丰富多彩的历史流程。

与纪传体相比，编年史在展现文学历程的复杂性、多元性方面获得了极大的自由，但在时代风会的描述和大局的判断上，则远不如纪传体来得明快和简洁。作为尝试，我们在体例的设计、史料的确证和选择方面采用了若干与一般编年史不同的做法，以期在充分发挥编年史长处的同时，又能尽量弥补其短处。我们的尝试主要在三个方面：其一，关于时间段的设计。编年史通常以年为基本单位，年下辖月，月下辖日。这种向下的时间序列，可以有效发挥编年史的长处。我们在采用这一时间序列的同时，另外设计了一个向上的时间序列，即：以年为基本单位，年上设阶段，阶段上设时代。这种向上的时间序列，旨在克服一般编年史的不足。具体做法是：阶段与章相对应，时代与卷相对应，分别设立引言和绪论，以重点揭示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时代特征（现当代文学因时间周期较短，拟省略阶段，不设引言）。其二，历史人物的活动包括“言”和“行”两个方面，“行”（人物活动、生平）往往得到足够重视，“言”则通常被忽略。而我们认为，在文学史进程中，“言”的重要性可以与“行”相提并论，特殊情况下，其重要性甚至超过“行”。比如，我们考察初唐的文学，不读陈子昂的诗论，对初唐的文学史进程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了解；我们考察嘉靖年间的文学，不读唐宋派、后七子的文论，对这一时期的文学景观就不可能有准确的把握。鉴于这一事实，若干作品序跋、友朋信函等，由于透露了重要的文学流变信息，我们也酌情收入。其

三、较之政治、经济、军事史料，思想文化活动是我们更加关注的对象。中国文学进程是在中国历史的背景下展开的，与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均有显著联系，而与思想文化的联系往往更为内在，更具有全局性。考虑到这一点，我们有意加强了下述三方面材料的收录：重要文化政策；对知识阶层有显著影响的文化生活（如结社、讲学、重大文化工程的进展、相关艺术活动等）；思想文化经典的撰写、出版和评论。这样处理，目的是用编年的方式将中国文学进程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中国思想文化变迁一并展现在读者面前。

《中国文学编年史》是一个基础性的重大学术工程，文献的广泛调查和准确使用是做好编纂工作的首要前提。《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书丛刊》、《丛书集成》、《笔记小说大观》等是我们经常使用的典籍，近人和今人整理出版的别集、总集，大量年谱（如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以及文、史、哲方面的编年史，均在参考范围之内，限于体例，未能一一注明，谨此一并致谢。在使用上述文献的过程中，我们采取的是一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谨慎态度。这是因为，相当一部分典籍是由我们第一次标点，这一工作的难度是不言而喻的。即使是前人已经整理的典籍，我们也并不直接采用，而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再整理一次。这样做当然增加了工作量，但确有许多好处，若干错误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得到纠正的，有些错误的纠正涉及基本事实的澄清。比如，张大复《皇明昆山人物传》卷八记梁辰鱼晚年情形，有云：“（梁氏）当除夕遇大雪，既寝不寐。忽令侍者遍邀诸年少，载酒放歌，绕城一匝而后就睡。曰：‘天为我辈雨玉，可令俗人蹴踏之耶？’时年已七十矣。亡何，中恶，语不甚了。有老奴李用者，颇省其说，尚有注记。得岁七十有三。”一位学者将“中恶，语不甚了”标点为“中恶语，不甚了”，并就此推论说：“梁辰鱼七十岁时遭遇暧昧不明的事件。”“《皇明昆山人物传》的上述记载本意是为贤者讳，事实上倒很可能为统治者隐盖了迫害异己文人的一件罪行。”这就不免弄错了事实。“中恶”即突然患急病，正所谓“老健春寒秋后热”，老年人得急病是常见的情形。而“中恶语”的表述，明显不符合古人的语言习惯。再如，陈田《明诗纪事》将正德时期的傅汝舟与明末的傅汝舟混为一人，将两人的生平搅在一起，其按语云：“丁戊山人诗初矜独造，晚遁荒诞，择其人格者录之，亦是幽弦孤调。山人享大年，具异才，谈佛谈仙，亦作北里中艳语。初与郑少谷游，晚乃与茅止生、卓去病、张文寺、文太青倡和，支离怪

诞，无所不有。少谷集中无是也。论者乃专谓山人刻意学少谷，何哉？”《明诗纪事》近三百万言，卓有建树，是研究明诗的必备案头书。但关于傅汝舟，陈田的确弄错了。郑善夫（1485—1523）号少谷，以学杜著称，学郑少谷的是正德年间的傅汝舟；文翔凤号太青，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与文太青等唱和的是明末的傅汝舟。两个傅汝舟之间相距约百年，陈田想当然地将二者合为一人，说他“享大年”，又说他前期学郑少谷，后期学竟陵派，曲意弥缝，令人哑然失笑。其他种种，如部分文学家辞典对作家生卒年的误注，若干点校本的断句错误等，我们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了纠正。提到这些情况，不是想证明我们的水平有多高，而意在告诉读者：我们的工作态度是认真的，有志于为读者提供一部值得信赖的编年史著述。

《中国文学编年史》的编纂得到了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华书局、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山东曲阜师范大学、中南民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单位专家和领导，尤其是武汉大学领导的支持；湖南省新闻出版局、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及湖南人民出版社鼎力支持编年史的编纂出版，所有这些，我们将永远铭记在心。

陈文新

2006年7月23日于武汉大学



凡例

一、《中国文学编年史》以编年形式演述中国文学发展历程，凡十八卷：第一卷周秦、第二卷汉魏、第三卷两晋南北朝、第四卷隋唐五代（上）、第五卷隋唐五代（中）、第六卷隋唐五代（下）、第七卷宋辽金（上）、第八卷宋辽金（中）、第九卷宋辽金（下）、第十卷元代、第十一卷明前期、第十二卷明中期、第十三卷明末清初、第十四卷清前中期（上）、第十五卷清前中期（下）、第十六卷晚清、第十七卷现代、第十八卷当代。

二、编年史各卷据文学发展的不同阶段划分为若干章（如无必要，或不分章）。章的标目方式是：“××章 ××年至××年，共××年”。关于某一阶段文学的总体评论放在该章的首年之前，如明前期卷“第一章 洪武元年至建文四年，共35年”，在章目下，“洪武元年”之前，单列明前期卷“引言”一目。关于某一时代文学的综合论述，放在卷首。如元代卷，在第一章前，单列元代文学“绪论”。

三、编年史各卷所收录内容的构架大体统一，重点包括七个方面：1. 重要文化政策；2. 对文学发展有显著影响的文化生活（如结社、讲学、重大文化工程的进展、相关艺术活动等）；3. 作家交往（唱和、社团活动等）；4. 作家生平事迹；5. 重要作品的创作、出版和评论；6. 争鸣（团体之间、个人之间在重要问题上的论辩等）；7. 其他。

四、叙事以纲带目，即在征引相关文献之前有一句或数句概述。如，先总叙一句“俞宪编《盛明百家诗》成书”，再征引相关序跋、著录、评议。前者为纲，后者为目，纲、目配合，旨在完整地呈现文学史事实。少量见于常用工具书的重要史实，或不必展开的文学史事实，则列纲而略目，以省篇幅。

五、公历纪年年初与中国传统纪年年末不属同一年份，如公元1899年元月1日至12月31日对应于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十一月二十七日至光绪二十五年己亥十一月二十九日，而不对应于光绪二十五年己亥正月初一至十二月三十日。我们采用变通的处理方法，以公历纪年，而以农历纪月，比如，凡光绪二十五年己亥正月至十二月之内的内容均置于公元1899年下。作家生卒年，仍据公历标注，其他以此类推。现、当代文学部分，纪年、纪月均据公历。

六、同一年内之文学史实，按月份先后顺序排列。月份不详而仅知季度的，春季置于三月之后，夏季置于六月之后，其他以此类推。季度、月份均不详者，另设“本年”目统之。

七、一部分重要文学史实，年月不详而仅知大体时段者，在年号之末另设“××年间”目统之，如嘉靖四十五年之后另设“嘉靖年间”一目。

八、引用序跋，一般采用“作者+篇名”的方式，如“臧懋循《唐诗所序》”。引用序跋之外的诗文等作品，一般采用“集名+卷次+篇名”的方式，如“《有学集》卷三一《隐湖毛君墓志铭》”，采用“作者+篇名”的方式，如“钱谦益《隐湖毛君墓志铭》”。无篇名者则省略，如“《艺苑卮言》卷三”。某作者集中所收为他人别集所作的序跋，亦采用这一方式，如“《太函集》卷二二《弇州山人四部稿序》”。引用正史，一般采用“正史名+本传或××传”的方式，如“《明史》本传”或“《明史》李攀龙传”，不标卷次。引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或用全称，或简称“四库提要”，只标明卷次。如“四库提要卷一五三”。引用地方志，标明纂修年代，如“光绪《乌程县志》卷三一”。据类书转引时，注明原出处，如“《太平广记》卷二〇《阴隐客》（出《博异志》）”。引用报刊，注明年月日或卷次。

九、作者小传一般置于生年。有些作家，虽生年在上一卷，但在上一卷无文学活动，其小传酌情移入本卷首次出现时。如杨士奇，元亡时才4岁，其小传置于明前期卷，出生时只交代：“杨士奇（1365—1444）生”，不列小传。现、当代作者，因传记资料常见，相关作家小传酌情收录。

十、对于某一作家的总体评论和重要著录一般置于卒年。某作者卒年在下一卷，但在下一卷无重要文学活动，主要评论材料酌情置于本卷。如易顺鼎（1858—1920），其评论材料集中于晚清卷，不入现代卷。

十一、作家代表作一般不录原文，但收录重要评论材料，并酌情说明相关选本收录情形。

十二、需要补充交待而占用篇幅较大的文学史事实，设少量“附录”。对若干需要辨证的史实，设按语加以说明。以提供文献线索为主，不详加征引。



绪论

余阙《杨君显民诗集序》：我国初有金、宋，天下之人，惟才是用之，无所专主，然用儒者为居多也。自至元以下，始浸用吏，虽执政大臣，亦以吏为之。由是中州小民，粗识字、能治文书者，得入台阁，共笔札，累日积月，皆可以致通显，而中州之士见用者遂浸寡。况南方之地远，士多不能自至于京师，其抱材蕴者，又往往不屑为吏，故其见用者尤寡也。及其久也，则南北之士，亦自町畦以相訾，甚若晋之与秦，不可与同中国，故夫南方之士微矣。延祐中，仁皇初设科目，亦有所不屑，而甘自没溺于山林之间者，不可胜道，是可惜也。夫士惟不得用于世，则多致力于文字之间以为不朽，而文辞者有幸有不幸者，不幸者至于老而无所用矣，而其文又遂泯不显，是可哀也。比年大江之南，山林之士有挟其文艺游上国，而遇知于当世。士之弹冠而起者，相踵京师。大官之家，皆有其客，而遇知于当世者，亦比比有之。（《青阳集》卷二）

戴良《求我斋文集序》：昔人谓文章与世相高下，然亦恒发于山川之秀，本诸文献之传。以鄞一郡观之，其地环以大海，而四明、骠骑诸山，往往趋海而尽。士生其间者，率伟茂博洽，有古作者之遗风。由宋而上，固不必论。国朝以来，践扬清华，出入禁近，所以鬯宣皇仁、黼黻休光于无穷，则文清袁公其人也。托迹丘园，淑艾来学，而指画口授，使疑者冰开、虚心者满怀，则敬叔程公其人也。于是以道郑先生之出，实与二公相先后。朝讲夕辩，学日以肆，自经史传记诸子以及天文、地理、历算、兵刑、食货、医卜、释老之书，罔不悉究。其所为文章，虽不尽守近世师儒绳尺，而规模论议，要不随人之后，至其佳处，自可追配古人。（《九灵山房集》卷二十一）

王祹《赠陈伯柔序》：有元以来，大江之西有二大儒焉，曰吴文正公、虞文靖公。文正之学主于为经，其于群经，悉厘正其错简，折衷其疑义，以发前儒所未发而集其成，讨论该洽，封殖深固，视汉儒之颀门名家者有间矣。文靖之学主于修辞，其于文辞，养气以培其本，知言以极其用，凡以载斯道而传之世，故其羽翼圣教，黼黻人文，卓然为一代之所宗，而自成一家之言者也。二公之学，虽其径庭有若异向，然要皆圣贤之为道，其趋一而已矣。后学之士，乌可妄议乎哉！（《王忠文集》卷五）

徐一夔《嘉兴路新建儒学记》：学校之设，国家风化之机在焉，非细故也。尝窃闻之，初国家起自朔漠，以威武立国，未遑学校之事。中统、至元之际，天下大定，许



文正公衡用儒术为辅相，凡其谋谟，皆经国大计，至于学校一事，尤切切言之。其言自国都以及州县皆设学校，使皇子以至庶人之子，皆从事日明君臣父子之道，自洒扫应对以至治国平天下，迟以十年，则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而上下亲睦。此诚不可拔之论。然当是时，国学肇建，而州县尚多苟且。延祐更化，上深厌吏蠹，赫然欲剗去之，顾学校难须成于月日，断以科目取士，盖将朝用其人而夕收其效也。大抵天下之势，此急则彼缓，矧夫上之人以是求之哉！由是学校之设，始若冠之有旒，履之有绚，姑具人文而已。当国者以提调则付之守令，以勉励则付之风宪，曰有任之者矣。而受其任者，既不皆出于儒术，而钱谷词讼又从而夺之，几何不视为迂阔之务。月更朔望，相率入谒庙廷，退坐论堂，引师弟子剿取儒先成说，敷陈一过，已则掉臂而去。如是以为故事，而欲学校有成如文正所云，其可得乎？循习之久，卒至人纪废坏，寇贼奸宄，以迄于今弗振者，职此由也。（《始丰稿》卷二）

王彝《顺理斋记》：吴郡自昔衣冠之所萃，入国朝，其郡人若宋节幹颜公，若汤师言、龚子敬两先生，及礼部于公；其寓止若所南郑先生，若虞文靖公、黄文献公、太常柳公，皆卓然师表一世。故其学者知务经术，为文章必要诸理。其后湘东李一初先生，亦寓于是，学者又出其门焉。尹君伯章，吴人者，盖尝接闻诸君子之流风，而又及亲炙黄公，且尝与李先生游，其所学概可知矣。（《王常宗集》卷一）

释妙声《友桂轩记》：若夫秦汉则去古未远，王泽未熄，故其文非后世可及。自尔以来，代有作者，而莫盛于唐宋，然视秦汉则有间矣。自训诂之学行，而古文遂微。近世文运中兴，制作尤盛，其间卓然振古豪杰之才，无让于昔。而牵于时尚，不得不靡而从之，此其文终有愧于古也与？抑又闻之，古人论立言者，谓汉不如秦，秦不如周，世愈降而愈下，时势则然也。今之论者，往往守其师说，好是今非古，而吹求其失，不亦过乎？古语有之：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因诵所闻，而遂及此，非论文也。（《东皋录》卷中）

陈相《白云集序》：吾婺道学之传，自宋东莱吕成公以身任其道，倡鸣于南渡之后，卓乎不可及已。元有仁山金文安公，以其传于北山何文定公、鲁斋王文宪公者，而传之白云许文懿公。盖北山得于勉斋黄氏，而勉斋实出考亭朱子之门，故传得其正，粹然以道名家。他如待制浦阳柳公、侍讲乌伤黄公、礼部兰溪吴公、翰林东阳张公，以及国朝学士景濂宋公、待制子充王公，皆以斯文羽翼其道者也。海内论乡学渊源之懿，师友继承之笃，盖莫如吾婺。（《白云集》卷首）

《草木子》卷四下：古之圣贤立心，至公无我。其官人之道，必曰禄罔及私，官惟其能；爵罔及恶，德惟其贤。此其所以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也。元朝天下，长官皆其国人是用。至于风纪之司，又杜绝不用汉人、南人，宥密之机，又绝不预闻矣。其海宇虽在混一之天，而肝胆实有胡越之间。不过视官爵为己私物，其视古圣立贤无方之道，果如何哉？不知天位天禄，天以命有德，宁能屯膏吝赏，久蔽于汉人、南人哉？是以不及百年，大乱继踵，而爵禄皆归中原之人。盖祸福乘除，其数然也。由是观之，人谋岂能夺天造哉？孰若均平天施，无有南北之分，惟才是任，惟贤是使。譬之水泽，使百川分流，则大有所滞，小有所泄，滔滔汨汨，庶为悠久。若使壅并防遏，蓄而不泄，及其溃决，小则为灾，大则致败，必然之理也。

虞集《傅与砺使诗集序》：国初，中州袭赵礼部、元裕之之遗风，宗尚眉山之体。至涿郡卢公稍变其法，始以诗名东南，宋季衰陋之气，亦已销尽。大德中，文章辈出，赫然鸣其治平。集所与游者亦众，而贫寒相望，发明斯事者，则浦城杨仲弘、江右范德机其人也。杨之合作，吴兴赵公最先知之，而德机之高古神妙，诸君子未有不许之者也。其后马伯庸中丞用意深刻，思致高远，亦自成一派，观者无间言。而进士萨天锡者，最长于情，流丽清婉，作者皆爱之。而与前之诸公先后沦逝，识者然后知其不可复得也。（《傅与砺诗文集》卷首）

虞集《庐陵刘桂隐存稿序》：国朝广大，旷古未有，起而乘其雄浑之气以为文者，则有姚文公其人。其为言不尽同于古人，而伉健雄伟，何可及也。继而作者，岂不瞠然其后矣乎。当是时，南方新附，江乡之间，逢掖缙绅之士，以其抱负之非常幽远而未见知，则折其奇杰之气，以为高深危险之语，视彼靡靡混混，则有间矣。然不平之鸣，能不感愤于学者乎？而一二十年，向之闻风而仿效亦渐休息。延祐科举之兴，表表应时而出者，岂乏其人。然亦循习成弊，至于骤废骤复者，则亦有以致之者然与？于是执笔者肤浅则无所明于理，蹇涩则无所昌其辞，徇流俗者不知去其陈腐，强自高者惟傍窃于异端。斯文斯道，所以可为长太息者，常在于此也。（《桂隐文集》卷首）

欧阳玄《潜溪集序》：三代而下，文章唯西京为盛。逮及东都，其气浸衰。至李唐复盛，盛极又衰。宋有天下百年，始渐复于古。南渡以还，为士者以泛焉无根之学而荒思于科试，间有稍自振拔者，亦多诞幻卑冗，不足以名家，其衰又甚矣。我元龙兴，以浑厚之气变之，而至文生焉。中统、至元之文庞以蔚，元贞、大德之文畅而腴，至大、延祐之文丽而贞，泰定、天历之文贍以雄。涵育既久，日富月繁，上而日星之昭晰，下而山川之流峙，皆归诸粲然之文，文意将超宋唐而至西京矣。（《宋濂全集》附录）

苏天爵《书吴子高诗稿后》：我国家平定中国，士踵金宋馀习，文辞率粗豪衰沓。涿郡卢公，始以清新飘逸为之倡。延祐以来，则有蜀郡虞公、浚仪马公，以雅正之音鸣于时，士皆转相效慕，而文章之习，今独为盛焉。（《滋溪文稿》卷二十九）

杨维桢《王希赐文集再序》：我朝文章，肇变为刘、杨，再变为姚、元，三变为虞、欧、揭、宋，而后文为全盛。以气运言，则全盛之时也。盛极则亦衰之始。自天历来，文章渐趋委靡，不失于搜猎破碎，则沦于剽盗灭裂，能卓然自信不流于俗者几希矣。吾尝以近代律今之文，仅得与曾巩、苏辙、王安石、李清臣、陈无己之流相追逐，相亡而中衰也，已不得步武于陆游、刘克庄、三洪、矧叶适、陈传良、戴溪乎？不得步武于叶适、戴溪、陈传良，矧晁、张、秦、黄乎？不得步武于晁、张、秦、黄，矧二苏、欧阳乎？时则举子之伎兴矣，不惟代无作者，而鉴识衡定为之先者，无其人也亦久矣。（《东维子集》卷六）

杨维桢《剡（郟）韶诗序》：我元之诗，虞为宗，赵、范、杨、马、陈、揭副之，继者迭出而未止。吾求之东南，永嘉李孝光，钱塘张天雨，天台丁复、项炯，毗陵吴恭、倪瓒，盖亦有本者也。近复得永嘉张天英、郑东，姑苏陈谦、郭翼，而吴兴得郟韶也。韶诗清丽而温重，无穷愁险苦之态，盖其强力于学未止。探其本之所出，极其作之所诣，盖得《骚》之声，得《雅》之情，则《雅》之声矣，又岂直在元诗一人之



数，追逐李、张、丁、项辈而止乎？（《东维子集》卷七）

杨维桢《两浙作者序》：曩余在京师，时与同年黄子肃、俞原明、张志道论闽浙新诗。子肃数闽诗人凡若干辈，而深诋余两浙无诗，余愤曰：“言何诞也，诗出情性，岂闽有情性，浙皆木石肺肝乎？”余后归浙，思雪子肃之言之冤，闻一名能诗者，未尝不躬候其门，采其精工，往往未能深起人意。阅十有馀年，仅仅得七家，其一永嘉李孝光季和，其一天台项炯可立，其一东阳陈樵君采，其一元镇，其二老释氏，曰句曲张伯雨、云门思断江也。昔王、刘二子能重河朔，矧七家者不足以重两浙乎？惜不令子肃见之。尝论：诗与文一技，而诗之工为尤难。不专其业，不造其家，冀传于世，妄也。盖仲容、季和放乎六朝而归准老杜，可立有李骑鲸之气，而君采得元和鬼仙之变，元镇轩轾二陈而造乎晋汉，断江衣钵乎老谷，句曲风格夙宗大历，而痛厘去纤艳不逞之习。七人作备见诸体，凡若干什，目曰《两浙作者集》，非徒务厌子肃之言，实以见大雅在浙，方作而未已也。若其作者继起而未已也，又岂仅仅七人而止哉！（《东维子集》卷七）

张翥《圭塘小稿序》：昔人论文章，贵有馆阁之气。所谓馆阁，非必揆藻于青琐石渠之上，挥翰于高文大册之间，在于尔雅深厚，金浑玉润，俨若声色之不动，而薰然以和，油然以长，视夫滞涩怪僻、枯寒褊迫，至于刻画而细、放逸而豪以为能事者，径庭殊矣。故识者往往以是概观其人之所到，有足征焉。本朝自至元、大德以迄于今，诸公辈出，文体一变，扫除俚偶迂腐之语，不复置舌端，作者非简古不措笔，学者非简古不取法，读者非简古不属目，此其风声气习，岂特起前代之衰，而国纪世教，维持悠久，以化成天下者，实有系乎此也。（《中州名贤文表》卷二十二）

郑玉《胡孟成文集序》：皇元混一，五星聚斗，文运向明，文体为之一变，然起衰救弊如韩、欧公者，卒未见其人焉。于是学者各以其见之所及，力之所能，家自为学，人自为师，以鸣于世，以俟夫后之韩、欧而是正之。如吾友胡君孟成，亦其一也。（《师山遗文》卷一）

张以宁《甌山存稿序》：儒学莫盛于前代之宋氏，大要尚道义而下词章，而始以学古倡者，则已崇理致。黜崛奇而主平易，忌艰深而贵敷鬯，蕲以复古之作者，又恐沿袭而少变焉，是以其词纾徐而曲折。及其后也，融之以训诂，发之以论说，专务明乎理，是以其词详尽而周密。其于诗也亦然。盖不为秦汉以来之杰然者，而隐然为宋氏一代之文矣。婺为郡，儒先东莱吕成公之里也，近何、王、金、许氏得勉斋黄公之传于徽国朱文公者，以经学教于乡。及学士黄公、待制柳公诸贤辈出，又以词章仕于朝，而故太常博士古愚胡君，实同一时，后先倡和，其源流之所自，盖可睹矣。（《翠屏集》卷三）

张以宁《桐华新稿序》：昔者王道盛而雅颂兴，帝功成而乐章作。世隆，诗道固从而隆也。我元德迈于周汉，覆载之内，血气之伦，仁涵义浹，百有廿年于兹矣。士之沐浴膏泽，咏歌泰和，若蛰之于雷，奋不可遏，则诗焉而复古之道也宜哉！温陵故文献邦，今尤为乐国，缙绅之所庐，冠带之所途，地又多名山水，能言之彦，颖然于决科外致力为诗，鬯舒襟灵，蜕去尘坌。暇日，辄会于城西南之隅清果寺，寓公游士，俊异咸集，僧之名者亦预焉。余读之而三叹曰：大夫士幸得生盛时，目不睹金革事，

能声于诗以自著，不自菲薄，亦犹古之道乎，治世之音乎？（《翠屏集》卷三）

陈基《孟待制文集序》：国朝之文凡三变。中统、至元以来，风气开辟，车书混同，名家作者，与时更始，其文如云行雨施，霏霏万物，充然有馀也。延祐初，继禅之君虚己右文，学士大夫涵煦乎承平，歌舞乎雍熙，出其所长，与世驰骋，黼黻皇猷，铺张人文，号极古今之盛。然厉金石以激和平之音，肆雕琢以泄忠厚之朴，而峭刻森严，殆未易以浅近窥也。天历之际，作者中兴，上探诗书礼乐之源，下泳秦汉唐宋之澜，摆落凡近，宪章往哲，缉熙《典》、《坟》，照耀日月，登歌清庙，气凌《骚》、《雅》，由是和平之音大振，忠厚之朴复还。其用力也，如藺相如抗身秦庭，全璧归赵。呜呼，亦不易矣。（《夷白斋稿》卷二十二）

戴良《丁鹤年诗集序》：昔者成周之兴，肇自西北。西北之诗，见之于《国风》者，仅自邠、秦而止。邠、秦之外，王化之所不及，民俗之所不通，固不得系之列国矣。我元受命，亦由西北而兴，西北诸国，若回回、吐蕃、喀和尔、伊啰、勒昆、唐古尔辉之属，往往率先臣顺，奉职称藩。其沐浴休光，沾被宠泽，与京国内臣无少异。积之既久，文轨日同，而子若孙遂皆舍弓马而事诗书。至其以诗名世，则贯公云石、马公伯庸、萨公天锡、余公廷心其人也。论者以马公之诗似商隐，贯公、萨公之诗似长吉，而余公之诗则与阴铿、何逊齐驱而并驾。他如高公彦敬、纓公子山、达公兼善、雅公正卿、聂公古柏、幹公克庄、鲁公至道、王公廷圭辈，亦皆清新俊拔，成一家言。此数公者，皆居西北之远国，其去邠、秦盖不知其几千万里，而其为诗，乃有中国古作者之遗风，亦足以见我朝王化之大行、民俗之丕变，虽成周之盛莫及也。（《鹤年诗集》卷首）

戴良《夷白斋稿序》：我朝舆地之广，旷古所未有，学士大夫乘其雄浑之气以为文者，固未易以一二数。然自天历以来，擅名于海内，惟蜀郡虞公、豫章揭公、金华柳公、黄公而已。方是时，祖宗以深仁厚泽涵养天下，垂五六十年，而戴白之老、童儿幼稚，相与鼓舞于里巷之间，晏然无以异于汉唐宋之盛时。故一时作者，率皆涵淳茹和，以鸣太平之鸿休，其摘辞则拟诸汉唐，说理则本诸宋儒，而学问则优游于周之未衰，学者咸宗尚之，并称之为虞、揭、柳、黄，而本朝之盛极矣。继是而起，以文名家者，犹不下数人，如莆田陈公之俊迈，则有得于虞公；新安程公之古洁，则有得于揭公；而临川危公之浩博，则又兼得夫四公之长者。郁郁彬彬，何可及哉！近年以来，独危公立帜词坛，自馀数公，常想见其丰采，习闻其警效，邈然其不可接者久矣。于是沦没殆尽，而得先生以绍其声光。……夫自周衰以来，至于今几二千载，其阅世非不远也，历年非不久也，能言之士非不多也，斯文能自振拔以追于古者，惟汉唐宋及我朝此四世而已。而四世之中，士之卓卓可称述者，又不过数人焉，何才之不数出，而人之难得若是哉！（《九灵山房集》补编下）

戴良《皇元风雅序》：唐诗主性情，故于风雅为犹近；宋诗主议论，则其去风雅远矣。然能得夫风雅之正声，以一扫宋人之积弊，其惟我朝乎！我朝舆地之广，旷古所未有。学士大夫乘其雄浑之气以为诗者，固未易一二数。然自姚、卢、刘、赵诸先达以来，若范公德机、虞公伯生、揭公曼硕、杨公仲弘，以及马公伯庸、萨公天锡、余公廷心，皆其卓卓然者也。至于岩穴之隐人，江湖之羁客，殆又不可以数计。盖方是



时，祖宗以深仁厚德涵养天下，垂五六十年之久，而戴白之老、垂髫之童，相与欢呼鼓舞于闾巷间，熙熙然有非汉唐宋之所可及。故一时作者，悉皆餐淳茹和，以鸣太平之盛治。其格调固拟诸汉唐，理趣固资诸宋氏，至于陈政之大、施教之远，则能优入乎周德之未衰。盖至是而本朝之盛极矣。继此而后，以诗名世者犹累累焉。语其为体，固有山林、馆阁之不同，然皆本之性情之正，基之德泽之深。流风遗俗，班班而在。刘禹锡谓八音与政通，文章与时高下，岂不信然欤！（《九灵山房集》卷二十九）

王祜《宣城贡公文集序》：国朝统一海宇，气运混合，鸿生硕儒，先后辈出，文章之作，实有以昭一代之治化。盖自两汉以下，莫于斯为盛矣。当至元、大德间，有若陵川郝文忠公、柳城姚文公、东平阎文康公、豫章程文宪公、吴兴赵文敏公，皆以前代遗老，值国家之兴运，其文庞蔚质奥，最为近古。延祐以后，则有临川吴文正公、巴西邓文肃公、清河元文敏公、四明袁文清公、浚仪马文贞公、侍讲蜀郡虞公、尚书襄阴王公，其文典雅富润，益肆以宏，而其时则承平浸久，丰亨豫大，极盛之际也。今天子元统以来，致治为尤盛，而文学之士，至于今则遂以日继沦谢，而几于寥寥矣。如广阳宋正献公、豫章揭文安公、待制东阳柳公、承旨济南张公、参政赵郡苏公，皆不可复作，而承旨庐陵欧阳公、谕德东明李公、侍讲金华黄公，虽岿然犹存，而亦既老矣。其方向任用而擅文章之名者，唯吾宣城贡公乎！（《王忠文集》卷六）

王祜《浦阳戴先生诗序》：昔日浦阳之言诗者二家焉，曰仙华先生方公韶卿、乌蜀先生柳公道传。方公之诗，幽雅而圆洁；柳公之诗，宏丽而典则。大抵皆取法盛唐，而各成一家言，用能俱有重名于当世。然方公隐者，其诗传之者鲜；而柳公尝待制翰林，天下莫不脍炙其言辞。于是二公不可作矣。继其学而昌于诗者，又得吾戴叔能先生焉。叔能之诗，质而敷，简而密，优柔而不迫，冲澹而不携，庶几上追汉魏之遗音，其复自成一家者欤！盖柳公学于方公，而叔能师事柳公为最久，渊源之懿，信不可诬。（《王忠文集》卷七）

王祜《文评》：於乎！以余观乎有元一代之文，其亦可谓盛矣。当至元、大德之间，时则抑（柳）城姚文公之文振其始；及至正以后，时则庐陵欧阳文公之文尝其终。即两文公之文而观之，则一代文章之盛概可见矣。盖尝评之，姚公之文如泰山之云，触石而起，层出叠见，蓊郁叆叇，而震雷掣电助其威声，曾不崇朝，雨及天下万物，被其润泽者，莫不昭苏而发育焉。欧阳之文，如沧溟之涛，浩瀚无际，长风四至，而汹涌山立，天吴罔象，蛟龙之属，因舞其间，及乎风止浪息，百怪沉冥，则巨艘大舶一夕千里矣。嗟乎！二公之文若是，岂非一代之雄于文者乎？宜其节惠易名，皆特谥为文，千载公议，孰得而诬之。是故唐三百年得谥为文者，惟韩子为合理，若李翱、权德舆则不足言矣。宋三百年得谥为文者，惟王荆公、朱徽公为称情，若杨亿、苏洵则有可议者矣。独有元百年之间，姚、欧相望，而两文之谥，始终有作，吾无间然矣。谓之为盛，岂非然哉？（《王忠文集》卷二十）

刘基《苏平仲文集序》：文以理为主，而气以摅之，理不明为虚文，气不足则理无所驾。文之盛衰，实关时之泰否。……故以宋之威武，较之汉唐弗侔也，而七帝相承，治化不减汉唐者，抑亦天运之使然与？是故气昌而国昌，由文以见之也。元承宋统，子孙相传，仅逾百载，而有刘、许、姚、吴、虞、黄、范、揭之俦，有诗有文，皆可



垂后者，由其土宇之最广也。（《诚意伯文集》卷十五）

胡翰《华川集序》：吾乡以学术称者，在至元中则金公吉甫、胡公汲仲为之倡。汲仲之后，则许公益之、柳公道传、黄公晋卿、吴公正传、胡公古愚，卓立并起，而张公子长、陈公君采、王公叔善，又皆彬彬和附于下。当南北混一，方地数万里，（原阙）物非可亿计，而言文献之绪者，以婺为称首，则是数君子实表砺焉。逮至正以后，黄公犹秉笔中朝。于是沦谢殆尽，而得吾子充绍其声光。（《胡仲子集》卷五）

朱右《泊川文集序》：予尝观近代僧家者流，以文鸣者固多，要其不失轨范，充然有馀，在元贞则天隐至公，天历则广智沂公也。天隐之文雅正舒畅，广智之文雄健超迈，然皆无林下习气。（《白云稿》卷五）

朱右《元朝文颖序》：气化流行之谓道，道之显著之谓文。道有升降，故文有盛衰，而国家之气化系焉。有元启运，肇造朔漠，著作之家，名世之士，所以裨治化、代王言、垂世范者，固已产于金宋未亡之前。风云类从，万物咸睹，混一雄厚之气，见诸言辞，岂偶然哉！……方南北未通，江汉赵氏默记朱子《四书集注》及各经传，身载以北。许文正公私淑有闻，以身任道，大阐其秘，上启君心，下饜人望，天下后世知所向方，无或有间，兴文开化之功，岂小补哉？此编自江汉而下，成一家言者，得六十余人，传诵之盛，有足以裨三代而轶汉唐，诎不盛欤？试尝读而评之。文者英华之外见者也，文采外见，莫花木若也。国初之文，犹花木之蓓蕾，蕤鄂未分，蔼然硕榦之气，殆窥见其精华。至大、延祐间，则葩敷蓂鬯，芬芳殊妍，风日滋荣，犹未露其夭巧。天历以来，春气毕达，百卉竞冶，奇态媚姿，光焰发越，则极其著见矣。夫物生而滋，滋而盛，盛而极，固亦气化之使然，尤于是可以观世变也。嗟夫，人物囿形气化，亦岂得容心于其间耶？（《白云稿》卷五）

胡行简《方壶诗序》：海宇混合，声教大同，光岳之气，冲融磅礴，而人材生焉。西北贵族，联英挺华，咸诵诗读书，佩服仁义。入则谋谟帷幄，出则与韦布周旋，交相磨砢，以刻厉问学，蔚为邦家之光。至元、大德间，硕儒巨卿，前后相望。自近世言之，书法之美如康里氏子山、扎刺尔氏惟中，诗文雄混清丽如马公伯庸、泰公兼善、余公廷心，皆卓然自成一家。其餘卿大夫士，以才谕擅名于时，不可屡数。若方壶常君，河右之伟人也。才总角，飘飘然有凌云气，下笔惊人，如不食烟火之语。暨长，遨游四方，充之以学问，广之以见闻。于是其所著述，大篇短章，咸中矩度，铿锵韶濩，翕辟宫商。惜其流落江南，遭回州县，不得与诸贤颉颃，颂歌清庙，以鸣太平之盛尔。（《樗隐集》卷五）

释来复《蛻庵集序》：呜呼，诗岂易言也哉！大雅希声，宫徵相应，与三光五岳之气并行天地间，一歌一咏，陶冶性灵，而感召休征，其有关于治教，功亦大矣。然自删后，至于两汉，正音犹完。建安以来，浸尚绮丽，而诗道微矣。魏晋作者虽优，不能兼备诸体。其铿锵轩昂，上追风雅，所谓集大成者，惟唐而后有之，降是无足采焉。逮及于元，静修刘公复古作，一变浮靡之习；子昂赵公起而和之，格律高深，视唐无愧。至若德机范公之清淳，仲弘杨公之雅贍，伯生虞公之雄逸，曼硕揭公之森严，更唱迭和于延祐、天历年间，足以鼓舞学者而风厉天下，其亦盛矣哉！（《蛻庵集》卷首）